

内部发行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 三 期

(总第十三期)

目 录

忆堂叔熊伯庚.....熊 征 五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

忆堂叔熊伯庚

熊征五

熊伯庚名长益，梁平县人，生于一九〇〇年，（清光绪庚子年）一九六四年逝世，终年六十四岁。父昌鸿、小商管生，民国初年去世，母杨氏、死于民国十四年。有姊妹各二人。他六岁入私塾读书，老师李同瀛，（号联舟）见他勤学好问，常常手不释卷、深得喜爱；可是家境困难，十岁便辍学了。为了维持生活，便去县城“聚丰当铺”当学徒，由于继续求学心切，仍然坚持借书攻读、不断自学，因而打下了中文基础。学徒期满出师，正值时局动荡，军阀混战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当铺业务萧条，聚丰当铺宣告倒闭。经人介绍到驻扎梁山的四川陆军第一军邱华玉部队充任连部录事，（缩写）借以糊口。后随军离别故乡多年。一九二五年才回家，由于书写工整，受聘于县立高小学校担任文牍工作。不久去成都考入警监专门学校，毕业的时候，校方屈于成都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“清共”的压力，对学员采取高压手段，学员被迫群起反抗，集体公开抗议，伯庚叔同吴正国等因组织了请愿游行，引起了学校对他们的注意，惟恐遭到迫害，因此放弃毕业考试及分配，离开了成都回到了梁平。路过蓬溪县时，被该地方武装错认为是当地正在缉捕的逃犯。又遭到拘留审查，通信来家，经多方请托梁山当政人士出具证明，才得到释放。中途至大竹，

经友人介绍便到大竹中学教书去了。据后来了解，在大竹教书时间，就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。

一九二九年陈克农同志任梁山县教育局长时，他受陈的邀请回县教育局担任文牍工作，并协助《教育旬刊》（地下党主办的进步刊物）的编辑业务。这个时候，他与梁山县地下党组织的李维、（平叔）李常善、王炎离等交往甚为密切，时当全国革命复苏时期，梁山、达县所属的虎城、南岳大游击区和太平、龙沙人民武装的建立，革命形势十分活跃。

一九三〇年五月，在中共梁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，为纪念上海“五卅”惨案五周年，在南门外“演武厅”操坝（即今南门车站），举行盛大集会，全城中小学校、城镇居民群众都激于爱国热忱，踊跃参加了大会。只有国民党梁山县指导委员会拒绝出席。当时主持大会的李次华即以此为理由，率领群众队伍，不顾沿街军警岗哨密布，直向毕家巷县党部进行质询，但县党部负责人早已逃之夭夭，这就更引起群众的愤慨，将县党部大门贴上十字封条封闭。这就是著名的梁山群众封闭国民党县党部的一次声势很大的斗争。而群众的斗争热情继续高涨，乘胜再往驻扎在县党部紧邻的二十一年三师七旅旅部请愿，旅部参谋长韩守斋出面答复：一方面假言劝慰，和缓了忿怒的群众激愤，一方面，暗怀鬼胎，外松内紧，反动的宪政军沉湎一气，密谋策

划后，竟于当天晚上，将熊伯庚，吴正国，曹敏之、袁人杰……等以嫌疑犯逮捕关押在伪县府肖冒庙警备队内。

伯庚叔方兴国（当时警备队长）带口信叫我去看他，我去时他神态自若与他闲话家常，乘看守未注意时，便在我身边轻语：“在我枕下有一张名单，速回烧毁。”我马上回家，（我们同任一院），找出名单，把它烧毁了。时间不过两点钟，中城镇长谢鼎铭亲率镇属模范队队长袁海清到我和他家搜查，幸未查出任何实据。接着，我父亲恳请了县中著名学界人士，前清秀才、又兼政务维持会委员张懋德、（又名梦蛟）粮务委员梁叔玉、教育前辈傅克明等同伪县长谢琮说情，同时地下党又请郑江向军方转守蒋疏通，伪县长拘于地方人士的人情，允许了“全案”保释。（所谓全案，即熊伯庚、吴正国、曹敏之、袁人杰等均由张懋德、傅克明具保释放。）我父亲虑有后患，立即派堂叔国诚将他护送到柏家场吴正国家暂避。随着白色恐怖进一步严重，情况也发生了新的恶化。关押在驻军旅部的地下党员李常善、王觀宗被伪旅长许绍宗杀害了。杀人、捕人、清党、清书、血雨腥风，笼罩大地。伪县政府也凶相毕露了，竟派人拘传熊伯庚、吴正国等到某堂审，在找不到他们时，把保人张懋德、傅克明二人还拘押县府一晚上，企图威胁他们交出人来。由于张、傅都是县中教育界名流，在旧社会有相当地位，事实上，保人不是当事人。伪县长也不敢过分得罪他们，

第二天便把他们释放了，家庭也幸免元事，伯庚叔他们又被迫转移到石安董家俊家；我父亲考虑到如此终非了结，为了他的人身安全，决不能留在家乡，仍派国诚叔伴送去万县聚源祥纸号暂住；纸号经理唐翰熙，又将他转送至汉口纸号，再乘火车才去到北平。到北平后，考入中国大学政经系读书。熊伯庚与我父亲虽属嫡堂弟兄，自幼分居，然而感情融合，故到北京后的一切读书费用，全靠我父亲维持到毕业。

一九三四年，他大学毕业后，在北京晨报担任编辑工作，与报社进步人士刘尊祺、陈博生等友善，抗战发生后，他们转来重庆工作时，彼此还保持了联系。一九三六年，他辞去了报社职务回到梁山，经我向梁中校长文赞臣推荐，在梁中任国文教员，由于教学认真，思想进步，颇得学生欢迎。后郑豫江任县财务委员长时，又被聘兼任文牍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我县政治形势日益好转，梁山“京派”部分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回梁，开展桑梓革命活动。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，由熊伯庚、李芳灿、钟纯乾、赵章明、肖国权等筹集资金，创办了进步报纸“梁山复兴日报”公开发行。与代表国民党旧势力的“梁山时报”针锋相对，担负起宣传革命理论和团结抗日等救亡工作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熊伯庚一面教书；一面担任编辑，报社职务，纯系义务，不辞辛劳，直到这年冬季，梁山复兴日报合并了梁山时报，进一步，打开了梁山报界的新局面。

一九三八年，李心白任县财务委员长时，他改任财务委员兼稽核主任。一九四〇年财务改制，财委会撤销，改为经收处，他担任征收处主任。值得回忆的是：当时“京”、“省”两派斗争愈趋激烈，对县属机关人事的争夺各施所能。以征收处主任一职为例，以国民党县党部为代表的省派，勾结伪县府的秘书肖道成，以毕照民出面，花了八百元银元，贿买这个职务。当时我任省财政视察员，由合川专区调大竹专区，（梁山属大竹专区）来梁视察。得知此事后，即以财政视察名义，质询县长刘慎旃，事属人赃俱在的受贿舞弊案，县长理屈词穷，便将责任推到秘书头上，将肖道成撤职了事，征收处主任仍由熊伯庚担任。此事表面上虽属我的职责范围，动机仍从熊伯庚的职位出发，但客观上起到了支持“京派”对“省派”的斗争，也即是帮助“京派”中的部分地下党人利用“京派”的合法手段与纯粹代表国民党的“省派”旧势力的不法行为作斗争。

一九四五年，他又被选为梁山县银行经理，由于一身廉洁，工作认真负责，用人唯贤，以银行协理陈佩璠、业务主任吴华宣为骨干，主持全盘业务，县银行内外声誉较高。改银行经理这个“肥缺”，在尔虞我诈，互相倾轧的旧社会里从未易人，连任到四九年解放。

熊伯庚早年从事革命，被迫离乡，自一九三六年回梁洋服务以来，一贯公正无私，勤慎自持，思想进步，拥护革命，热爱祖国是他处事

的原则。虽被划在“东派”之列，而拒绝参与派系的私相斗争。但对共产党地下工作，无不竭力维护和支持；凡遇同志有难，即挺身而出，冒险加以营救。有时他也和我共同出面，先后向伪县长赵秉铨、周维权等，保释营救过朱石魁等同志脱险。

梁山解放前夕，国民党川鄂绥靖主任蒋经国率部西逃时，途经梁山，仍贼心不死而伪县长蒋醴臣，将梁山地方武装组织起来打游击，同时封官蒋醴臣为川鄂绥靖公署第十一师长。蒋经国到梁山后，也积极部署，组织反共支队，委石廷宣、李西平、刘星曜各为一、二、三支队司令，尽力拉拢地方旧势力，委任聘请很多秘书、参议和名目繁多的伪职，企图逃往西山，负隅顽抗，弄得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尤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晚，蒋醴臣逃跑前夕，在县政府会议室，召集全县各方面上层人士开会，诱说加威胁要大家一道上山打游击。并逐个人逐个人地征求意见。有时表示“紫随县座上山游击”，有时虽不愿离乡别境，但表面仍表示“听师座指挥”，当问到熊伯庚时，他不顾蒋的淫威炙人，毅然拒绝，不但不愿同走，还不让乱用县银行任何一点物质，奋力把住了县银行这个财政关口，坚持了他早已成竹在胸的积极支援早日解放梁山的义举。会场气氛骤然转冷，蒋也十分狼狈，虽怒形于色，但迫于形势紧急，也无可奈何。走夜，蒋露宿机场，

七日晨，解放军由土城门进城后，才伙同心腹忙往北逃。从这一天起，蒋王朝在梁山覆灭了，苦难深重的梁山，才真正得到了解放。

发展地方文化事业，是他的宿愿。梁山解放后，在移交清楚县银行手续后，即向重庆新华书店函询表示：打算筹建梁山书店。很快得新华书店的答复：同意并加以鼓励。但他两袖清风，资金无法筹措，正在困难之时，中共梁山（后改梁平）县委书记李季买通知他去县人民政府，表示对筹建书店积极支持，并指示在初创困难时候，还可采取集股筹建的方法。在党的领导支持下，他立即去电重庆新华书店联系。并各方奔走，艰辛经营，终于在解放初期，新华书店梁山支店就诞生了。加上管理得法，营业良好，受到重庆新华书店的重视，还受托指导和帮助江、忠县新华书店的业务。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，还清了私债，扩大了营业范围，积累了资金，购买了书店房屋。

一九五七年，梁平县政协成立，在党的关怀下，他被选为政协常委，先后历三届，直到逝世。他在政协任职期间，发挥余热，积极为人民工作。除参加政协各项工作外，还译了旧《梁平县志》二本，为省文史资料写了《美蒋在梁平的罪行》一文。最后他还带病坚持不懈地写成了《辛亥革命梁山反正追记》长达万余字的文稿。为我县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一九六四年夏，病情愈趋恶化，在党和政协组织的照顾下，住院

治疗，弥留之际，政协领导再三慰问时，他从不提任何私人要求，只感激党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而对亲人遗嘱则有这样几句：“我没有为党做什么多的工作，对不起党。只希望崽崽大了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，为我弥补不足之处。”寥寥数语，概括了他拥党爱国廉洁奉公的耿介一生。